



国学经典书系（第一辑）初级版

总主编 雷恩海

《
论
语
》
《
孝
经
》

品读

路 尧 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
LANZHOU UNIVERSITY PRESS



国学经典书系（第一辑） 初级版

总 主 编	雷恩海						
副 主 编	陈晓强	曾贤兆					
编 委	蒋 凡	吴兆路	周绚隆	方 铭	马永强		
	雷恩海	陈文江	崔 明	陈晓强	曾贤兆		

《
论
语
》
《
孝
经
》

品
读

路 尧 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
LANZHOU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语》《孝经》品读 / 路尧著. — 兰州 : 兰州
大学出版社, 2016. 11

(国学经典书系 / 雷恩海总主编)

ISBN 978-7-311-05045-0

I. ①论… II. ①路… III. ①儒家②家庭道德—中国
—古代③《论语》—通俗读物④《孝经》—通俗读物

IV. ①B222. 2-49②B823. 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98285号

责任编辑 钟 静

封面设计 郇 海

书 名 《论语》《孝经》品读

作 者 路 尧 著

出版发行 兰州大学出版社 (地址:兰州市天水南路222号 730000)

电 话 0931-8912613(总编办公室) 0931-8617156(营销中心)

0931-891429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http://press.lzu.edu.cn>

电子信箱 press@lzu.edu.cn

印 刷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mm×1020 mm 1/16

印 张 19

字 数 262千

版 次 2017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11-05045-0

定 价 38.00元

(图书若有破损、缺页、掉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



序



雷恩海

—

“国学”是一个历史名词,出现于清末。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西方在完成其政治变革与工业革命之后,开始有计划地东进,东方世界成为西方开发的巨大市场,并且带着强烈的殖民性。欧风美雨东渐,以坚船利炮裹挟着强势的社会价值体系和思潮,先后对中国发动了五次侵略战争,而且曾是朝贡体系内的日本,也以强势侵袭。值此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学人惊惧、疑虑、拒斥、反思,有亡国灭种之忧患,进而提出要对中国的学术进行全面的研究。最有代表性的是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强调在保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有选择地吸收和借鉴与中国政治、文化不冲突的外来成分。实际上,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西方先于东方实行近代化,当东西方遭遇之时,必然会带来冲突。这一现象,就是冯友兰先生所说的“中西之交,古今之异”。“国学”的概念,就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应运而生。国学,即中国传统学术的简称。时任清华研究院主任的吴宓教授认为,“所谓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清华开办研究院之旨趣及经过》)。蔡尚思说:“国是一国,学是学术,国学便是一国的学术。其在中国,就叫做中国的学术。既然叫做中国的学术,那就无所不包了;既然无所不包,也就无所偏畸了。”并且说“中国的固有文化,都不能出此国学二字范围外”(《中国学术大纲》)。应对西方文化之强势进入而产生的“国学”概念,既要保全中国故有文





化学术,又要汲取西方学术文化之精髓,承载着统合中西文化的使命。1902年,黄遵宪《致梁启超书》赞同梁氏“养成国民,当以保国粹为主义,当取旧学磨洗而光大之”,并且说“今且大开门户,容纳新学。俟新学盛行,以中国固有之学,互相比较,互相竞争,而旧学之真精神乃愈出,真道理乃益明,届时而发挥之。彼新学者或弃或取,或招或距,或调和,或并行,固在我不在人也”,主张融会中西学术,开启国学之新局面。1911年,国学大师王国维为《国学丛刊》作序,明确指出:“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何以言学无中西也?世界学问,不出科学、史学、文学。故中国之学,西国类皆有之,西国之学,我国亦类皆有之,所异者,广狭疏密耳……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因而,“国学”就是运用西方近代科学研究方法,对中国学术加以系统的整理和总结,是中国现代性发展的必然,也是传统学术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寻找自身位置的一种努力。当时尚有国粹、国故之称。国粹,似乎夸大中国学术乃完全精粹;而国故则指本国文献(过去的文献),但国故只能代表研究的对象,而不能代表研究这种对象的学问。相比较而言,还是“国学”一词,比较全面公允一些。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兴起“国学”热,积极响应者有之,批评者有之。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国学”持续受到许多人的欢迎,人们对国学的认识也日趋理性。国学热之兴起,乃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心的恢复。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虽然我们的国力增强了,但到今天为止,我们仍然处于这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无论科技,还是文化等,西方仍然处于领先地位,世界仍然处于西方文化主导下的格局之中。那么,如何在科技和文化两个层面上成为世界强国,如何确立自己的文化价值、精神文明体系,确立文化自信,就是我们需要考虑的。显然,重新审视传统,阅读传统,就成为一种必然。国学热,乃民间自发,而最后由在上者所认识而进一步倡导。习近平主席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指出,“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



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极为精辟地指出了国学的根本内涵和意义。

研究国学,并非抒发思古之幽情,更不是排斥来自西方的新思想。国学是华夏民族文化的积淀,承载着传统文化,而传统是演进的而非僵化的,是历史与现在之间的价值纽带。国学不但是历史的积淀,而且也是面对现在而指向未来的。因此,以传统文化为核心的国学是不应该被忽略甚至于忘记的。忽略甚或忘记了传统,也就失去了当下的根基,无法谋划现实的生存,因而也无法明确未来的走向。譬如,一个人今天早晨起来后,他失忆了,忘记了昨天及以前的事情,那么,就意味着他失去了自我,不知道今天该干什么,无法安顿自己,即没有办法给自己一个定位。他忘记了自己的过去,站在大街上,茫然不知所从,不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是去市政府上班,还是进入学校教书,是去清扫马路,还是到工厂做工。不知道今天做什么,就无法安顿心灵,也就不知道自己的生存状态,那么他将如何生存呢?忘记过去,就是割裂其历史;不知道今天,那么,就无法知道明天。事实上,忘记了昨天,就意味着今天、明天都处于一个无所举措的状态。一个民族也是如此,忘记其传统,割断历史,就没有现在的发展和未来走向;而继承、发扬其优秀传统,以开阔的视野,吸收新的文化素养,吐故纳新,继往开来,它将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国学,从广泛意义上来说,就是华夏民族文化的历史记忆。学习国学,即在于传承文化,以一种广阔的视野和开放的心态,继往开来。“所谓文化,就是一个民族在悠长的历史中,在一种制度下形成的、渗透到民族的血脉中的集体记忆,一种思维方式、价值观和行为模式。”那种以学术为生命的不懈追求,正是对优秀文化的传承,是华夏民族的凝聚力所在。文化割弃了传统,是贫瘠的文化,最终也就导致其衰败。没有文化的民族,即没有其灵魂。陈寅恪先生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提出民族文化本位的问题:“是以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远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虽震动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沉歇绝……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

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

文化是民族的根性所在,马克思说:“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自己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传承文化,发扬优秀传统文化,以开阔的视野、恢弘的气度,与世界上诸多文化交流,使得华夏文明得以延续,继往开来,开拓创造华夏文化的新境界。冯友兰先生以哲学家的睿智,提出“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乃是对华夏文化生生不息的生命活力的高度概括,也是对华夏文化吸收外来文化,融入世界潮流的期望。“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希望华夏民族能够奋发图强,成为一个拥有优秀而悠远的文化传统、具有开阔视野和创新活力的现代化国家。没有继承,就没有创新,关键乃守正而出新。

二

一般来说,国学大致被理解为以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学问,其内容应包括经、史、子、集四部之学,融合儒释道诸家,而又以儒学为主体。事实上,国学乃一种载体,传承的精神品性、知识技能,可以说是经过时间淘汰而流传下来的精华。国学需要借鉴西学的研究方法,汲取其学术素养,全面整理、研究,融会贯通,传扬其优秀文化品质。一个人的成长,要有自身资源、家庭资源、社会资源,还要有历史资源。而这历史资源就是国学所承载的主要内容。

读书不仅仅是获取信息,储备知识。这种记诵之学,在严格意义上来讲,不是学习的根本目的。就是说,读书乃为求知,在于培养具有思想性的人才,借助作者的思维过程、思维方式,来训练自己的思维能力,提高自身的水平与





能力。知识之获得,不可能凭空而来,必须借助于某种媒介,通过一种介质的训练、培养,而使我们获得知识,化为能力,练人才性,提升思维能力。训练思维,培养能力,正是读书学习的关键。学习前代的文化典籍,正是训练思维、获得能力的一个重要途径。爬罗剔抉,提要钩玄,乃逻辑思维的归纳与演绎之训练。读一本书,如果仅仅停留在了解一个故事、事件的层面,显然是浅层次的;而有意识地、主动地借助于他人的思维方式、思维过程,训练自己的思维,培养自己观察问题、处理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无疑是深入的读解,达到了读书求知之目的。而阅读理论性的书籍,其精密的逻辑思维、推理论证、辨疑析难的能力,显然对训练思维、培养能力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刘勰《文心雕龙》说:“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绎辞。”源远流长、充实丰富、瑰丽多彩的国学经典,积淀为人类思想文化的精品。阅读、研究,正可以训练思维,培养能力。

然而,长期以来,我们忽略了对国学的阅读与传承,甚至于忽略了阅读本身。所谓“国学热”“文化热”,事实上并没有“热”起来,往往呈现为喧嚣的“争鸣”,甚至是浮躁的状态,尚未切实地进入阅读本身。在热闹、喧嚣的“文化热”氛围之中,如何自我定位,如何寻求阅读的对象、内容,需要做出“冷静”的判断。说到底,阅读是一种个人行为,是根据自己的知识结构、知识储备,进行有针对性的阅读,以进德修业,提高自身文化品性和判断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这就需要不盲从,不跟风,有自己的定见,根据自己的需要,或者研究的需要,有针对性地阅读,这样才会有比较快的提高。

所谓阅读,就是指对一部书,或者一篇文章,从头到尾地读下来。清人冯班在《钝吟杂录》中说:“多读书则胸次自高,出语皆与古人相应,一也;博识多知,文章有根据,二也;所见既多,自知得失,下笔知取舍,三也。”这样读书的好处,首先是专注。思想集中才有兴趣。无论任何科目,无论这科目是跟你的兴趣相差多远,只要你能对之集中思想,兴趣即盎然而生。第二个好处是系统深入地理解。因为能够专注地读完一篇文章、一部书,对作者的思想与意图以及文笔都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二十世纪的史学大师吕思勉先生说,他



读书是拿到一本书,从头读到尾,即使这部书不太好,也不中辍。因为从头读到尾,就会有一个自己的判断,好在何处,不好又在何处,斟酌损益,当有所得。第三个好处,思维空间很大,触类旁通。一篇文章或一部书,无论是记叙类的,或者是理论类的,都有一个明确的问题意识,会围绕着事件或问题,全面地展开,这样就给读者提供了一个全面思考的场域,从而调动自己的思维,开拓思维能力,进而提高自身的阅读能力和理解水平。第四个好处,就是训练思维,提高能力(阅读能力,理解能力,更是判断问题、分析问题、处理问题的能力)。就是说,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海量信息有时候是无用的信息,反而淹没了读者,导致他们不会判断、分析,成为散乱信息的收集者,成为“两脚书橱”。第五个好处,就是加强知识的系统性。任何知识都有其系统性。清代著名作家、画家郑板桥用盖房子的道理谈画竹子的体会:“昔萧相国何造未央宫,先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然后以别殿、内殿、寝殿、宫室、左右廊庑、东西永巷经纬之,便尔千门万户。总是先立其大,则其小者易易耳。”先立其大,即要有大判断,对研究对象要“目有全牛”,而不是盲人摸象。分清何者为主纲,何者为末节。主纲确立,而后细节才能发挥作用,有益于支撑和加强主纲,两者相得益彰,发挥更大的效益。知识是系统的,读者把握住一端,由此深入下去,既是深度的钻研,也是广度的拓展。这样读书,就能够触类旁通,举一反三,摆脱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偏狭。刘勰《文心雕龙·镕裁》说:“首尾圆合,条贯统序。若术不素定,而委心逐辞,异端丛至,骈赘必多。”知识系统和研究的领域逐渐扩大,对问题的认识,也就能够识其大体,有大判断。

三

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对我们的文化传统有所了解,既要知其精粹思想,也要了解其陈腐的观念;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还应有虚心诚实的心态,以了解之同情对文化传统继承与发扬。文化的发展,有累积性,也有否定性,因而才能创造性地继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革故鼎新,既要延续我们的文化,



又要创造新的文化传统。

与现代学科分类不太相同,国学包括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经世之学,涵盖传统四部分类的经、史、子、集,内容丰富,贡献巨大;既有知识性的体系,又颇重视经世之学,强调“载道”,传达一种精神品性。事实上,学术研究、文化传扬,实乃“网罗天下放佚旧闻,稽其成败兴废之理,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

因此,我们编撰这套“国学经典书系”,既重视知识的系统性,也强调“载道”及人格之养成。目的在于让读者了解,什么是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就是中国人基本的、核心的价值观以及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国学经典对人的道德品性形成,有其重要意义。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由内而外,由个体而推广及于整体、国家以至于天下;反过来,又由天下情怀而对个体的道德品性做观照,提高个体的境界。而且,国学经典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密切的关系,乐群、敬业、爱国、独立思考,既注意上下有序,又重视人的自觉与平等。乐和同,礼别异。在追求个性自由、重视个人之同时,也不忽略集体性,将个体与家国利益相统一;既要有灵活性,能够跨界创造,又要有持之以恒的毅力,坚守岗位。国学经典有助于培养读者的思维能力、思维方式,提高基本文化素养。从狭义来说,知识是技能性的,而文化则是一种能力,一种判断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是一种生存的境界。二十世纪的哲学大师冯友兰先生在《新原人》中指出人的精神境界可分为四种: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天地境界,不是直接的经世致用,而是融入了一种可以包容天地的胸襟,这是道德、人格的升华;升华到与万物为一,超越其他三个境界,而有了物我一体、万物皆备于我的相通,这时精神最为自由,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自由。这种对学术的痴迷,纯粹出于兴趣的探索精神,很有一些中国古人所说的“谋道不谋身”的意思,对形而上的“道”的追求,自然会获得“谋身”的结果。而原创性的科学发明和理论创造,所依赖的正是这种“谋道”的精神。国学经典是最佳的媒介,读书明理,获得能力,而非仅仅是“两脚书橱”的知识储备。世界文明古国,只有中国是自古



延续至今。“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传承创新，是我们现代中国人的使命。中国传统的辩证思维、坚韧不拔的毅力、文化的包容品性，都是我们走向未来、开创未来的思想文化资源。

“国学经典书系”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编选篇目，针对不同的读者群，分为初级版和普及版，由原文、题解、注释、品读、扩展阅读等模块构成。原文，选择佳好的版本，如精校本、注释本，选编原文，力求保持原典的本来面目，给读者提供一个可靠、佳好的文本，使读者能够对原典有一个全面、整体的把握。题解，乃是对所选的篇章、片段，做出一些必要的交代和说明，以便明了上下文之间的内容及关系，有助于读解文本。注释，力求简洁，一般只注字、词，不注句子，方便阅读和理解。品读，乃是对所选原文的品评、欣赏、理解，着重从故事性、趣味性上，从纵向与横向两个维度，讲述其丰富生动的内涵，“理”寓于“事”中，“事”因“理”而深刻、生动。品读也尽可能地揭示思想的力量、文章的内涵以及思维的逻辑，期望有助于阅读能力的提升。扩展阅读，则是选择与原文相关（相似或相反、不同视阈的记载等）的内容，或者见出所选的文字、故事在后世的影响或衍生，启发联想，拓展知识，训练思维。而品读和扩展阅读，事实上是将阅读与思考结合起来，“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弗朗西斯·培根说：“读书使人成熟，讨论使人丰富，写作使人严谨。”读、思、写三位一体，写是在多读深思的基础上自然而然的表现。写出来，才是对思维的进一步完善；读、思、写相结合，才能够最大限度地提升阅读水平，训练思维，进而使人可能具有天地境界。

这套书系的编撰，力求内容丰富、生动，富有启发性，引起读者对国学原典阅读的兴趣，丰富其国学素养，培养读书的境界。近代大学者王闿运说：张之洞是看书人，曾国藩是读书人，“所谓读书人，能通经致用；看书人，则书是书，人是人，了不相涉，即所谓记问之学、博而寡要者也”（刘成禺《世载堂杂忆》）。就是说，读书人要能掌握知识并应用于实践之中，知行合一。期望我们都做个有思想、有创造力的“读书人”。

人的全部尊严在于思想。读书学习，就在于确立一个人安身立命的根

基。古人云：“立身以力学为先，力学以读书为本。”所谓“立身”，实乃关乎其人之思想境界，而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是一个有思想的人，有思想的生命才是完整的。有什么样的思想境界，则有什么样的“立身”原则、行为方式，也因而确定了其人日后的成就。思想清明、品格伟大之人，介然有守而不因循守旧，也不随波逐流。读书人知行合一，多读书，可以怡情悦性、涵养性情，可以洞明事理、培育思想，从此打开一个智慧的世界。精骛八极，心游万仞，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何乐而不为呢？

2017年11月10日

春融堂

序



009



前言



《论语》是一部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录,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辑录而成,大约成书于战国初期,其中以记载孔子的言论为主要内容。孔子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的思想和主张,除了在他所整理、修订的文献典籍中有所寄托外,更直接的体现则集中在《论语》这部书中。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时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孔子的嫡系祖先是宋国贵族,其远祖本是殷商后裔,周灭商后,被封为宋国诸侯,所以孔子说:“丘也,殷商人也。”(《礼记·檀弓上》)孔子的十世祖弗父何本该继位为宋公,却让位给了弟弟,自己受封为卿,世代承袭。到了孔子的曾祖孔防叔时,宋国发生内乱,孔防叔的父亲孔父嘉无辜遇害,孔防叔为避祸而逃往鲁国定居,从此家道没落。孔子的父亲叔梁纥做过鲁国陬邑大夫,以勇力过人而闻名诸侯。叔梁纥六十多岁时,膝下有九女一子,但儿子孟皮却是个跛子,不宜继嗣。于是,他又娶了一位名叫颜徵在的女子,生下了孔子。孔子三岁时,父亲病故,母亲带着他离开陬邑,迁到曲阜的阙里居住。孤儿寡母,门第卑微,其辛酸艰难可想而知。

曲阜是鲁国的国都,礼乐传统积淀深厚,民风淳朴,崇古好礼。这样的环境,对孔子的成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幼时嬉戏,就常摆弄各种祭器,模仿大人们祭祀时的样子。稍长,由于家境贫苦,他不得不早早地外出谋生。他后来自述,“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



篇》),正是对早年生活的追忆。所谓“鄙事”,就是杂役粗活儿。据说,孔子曾经在某些典礼仪式中当过吹鼓手,还做过委吏、乘田等管理仓库和牲畜的小吏。这样的处境,使他没少遭贵族的白眼,但另一方面,也使他广泛地接触了底层民众,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经验,培养了他百折不挠的坚毅品质。

孔子生活的时代,天下动荡,王室衰微,作为天下共主的周天子名存实亡,社会变革的风潮此起彼伏。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孔子心怀匡救天下的抱负,一生以消除纷乱、安世济民为己任。他在十五岁时,立志向学,三十多岁已通晓“六艺”,鲁国贵族开始对他刮目相看。鲁昭公二十五年(前517),三十五岁的孔子曾试图在鲁国政坛上一试身手,最终却因一场内乱无果而终。直到鲁定公九年(前501),孔子五十一岁时,才被任命为中都宰,不久又升任司空、大司寇等职,并一度代理国相事务。在此期间,孔子在内政、外交方面,政绩卓著,令人惋惜的是,他一生中这仅有的一次正式出仕,前后不过持续了短短四年时间。公元前497年,面对鲁定公的怠政和“三桓”的排挤,五十五岁的孔子满怀失望,率弟子离开鲁国,开始了长达十四年的周游列国之行。这次游历,孔子先后到过卫、曹、宋、郑、陈、楚等国,无非是希望得到诸侯的重用,以实现他的政治理想,然而,他的施政主张和满腔热情却始终无人理睬。在颠簸多年、历尽坎坷之后,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六十八岁的孔子回到了他的故国鲁国。之后,他利用生命中最后时光,一面整理前代文献典籍,编修鲁国的史书《春秋》,一面继续以文化教育为务,传授学术,诲人不倦,直到七十二岁去世。

孔子在世时,针对当时的社会状况,“对症下药”,提出了一套“治世良方”,但却不见用于当权者,他本人也恹恹惶惶,“若丧家之狗”,到处碰壁。但是,作为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的思想经由弟子和追随者,在当时就已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孔子从三十多岁即已开始收徒讲学,坚持“有教无类”的原则,打破了“学在官府”的旧制,一生弟子多达三千,其中精通“六艺”的贤者有七十二人。《论语》一书,便是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对其活动与教学的直接或间接记录,虽然远未尽孔子一生之所言,但也可谓精华所在,堪称正宗元典。这部将近1.6万字的语录汇编,大体包含了孔子关于社会、政治、哲学、伦理、文



化、教育等诸多方面的见解,构成了儒家学说体系的基本框架,直接而集中地反映了孔子这位儒家学派创始人的思想。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仁”的意义几乎包括了一切美德,但却很难给它一个明确的定义。在《论语》中,“仁”字的出现不下百次,而孔子从未给出过统一的解释,往往针对不同的人和问题做不同的回答。仔细归结起来,仁的实质就是“爱人”。在《颜渊篇》,“樊迟问仁,子曰:‘爱人’”。“爱人”二字,概括了孔子博大的人格理想和道德追求。在孔子看来,普通人如能相互理解,相互帮助,推己及人,以爱己之心爱敬他人,社会才能和谐稳定;统治者如能以身作则,宽厚仁爱,“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让百姓安居乐业,民风自然淳厚,天下自然太平。

在“仁”之外,《论语》中反复讨论的另一命题是“礼”。“礼”是人们共同遵守的伦理道德规范,在孔子这里,具体是指周礼。在孔子的思想中,礼的地位虽然十分崇高,但却从属于仁,是达到仁的条件和路径。在《颜渊篇》,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所谓“克己复礼”,就是倡导当个人与他人、社会发生观念、利益等冲突时,每个人都要适当地克制自己的私欲,自觉地使自己的思想、行为符合社会规范,这样就能做到最大限度的“爱人”,从而协调人际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缓和社会矛盾。因此,可以说,“仁”的核心是“爱人”,而它的条件是“克己”。

孔子的思想和主张,对当时社会的影响是有限的,时过境迁,后来却被视为“治国宝典”,在西汉以后的两千多年中,广泛而深入地浸入到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有人甚至宣称,只需半部《论语》,便可天下大治。孔子本人,也被奉为圣人,头上的光环逐渐遮蔽了他的本来面貌。20世纪以来,孔子又被作为“封建糟粕”的代表,屡次遭到残酷甚至荒唐的挞伐。近年来,社会上兴起了“国学热”,孔子和《论语》以及其他儒家经典再次引起国人的重视,但在具体过程中,却不无矫枉过正之嫌。匡亚明先生说:“孔子思想中既有消极因素,也有积极因素,这两种不同因素导致了两种不同后果,前者使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不前,后者则形成了中华民族某些优良传统和特点。这种矛盾现象是孔子思想内在二重性(矛盾性)的毫不奇怪的产物。”(《孔子评传》)包括

《论语》在内的古代经典,都是祖先留下来的文化遗产,我们应当继承和发扬,但绝不是不加分析,良莠并收,而是切切实实地走进文本,深刻反思,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就《论语》而言,应该将它置于春秋末期特定的历史条件、社会环境及具体语境中认真考察,从中体会孔子的良苦用心,全面把握其思想实质,了解其缺陷或局限性。

《论语》一书,文字简约而意旨深远,体现了孔子思想的深刻性和复杂性;但它作为一部未经孔子之手的语录体著作,往往只摘取其精华语句,而忽略了语句的具体环境或思辨过程,而且篇章排列随意而无序。这就使得其中许多语句的观点与主张因缺乏事实依据或理论论证而显得孤立,易于产生歧义,常常被误解,甚至被歪曲。

在《论语》被列为经典之后,历代注家蜂起,做了大量的注疏工作,据有人统计,古今各类注本达三千多种。其中较为著名的有西汉郑玄《论语注》、三国何晏《论语集解》、南朝皇侃《论语义疏》、北宋邢昺《论语注疏》、南宋朱熹《论语集注》、清刘宝楠《论语正义》等;近人注疏又有程树德《论语集释》、杨树达《论语疏证》、钱穆《论语新解》、杨伯峻《论语译注》等。由于《论语》本身的特殊性,加上译注者个人和时代的因素,诸家对《论语》部分内容的理解多各有所见,个别地方甚至大相径庭,至今难有定论。当然,这并不是主要的方面。

今本《论语》共20篇,每篇取篇首二三字为题,篇下分章。本书《论语》原文以朱熹《论语集注》为底本,参考杨伯峻《论语译注》,有针对性地各篇中选出219章,按照丛书体例要求,进行注释品读,并辅以部分“扩展阅读”。

《孝经》是儒家经典中篇幅最小的一部,今文《孝经》共18章,仅1700多字。关于《孝经》的作者,自古以来,莫衷一是,最主要的说法有三种:孔子说、曾子说、曾子门人说。其成书年代也说法各异,一般认为,其书春秋时期已具雏形,又经后儒整理,于战国中后期最终成书。

《孝经》篇幅虽小,但它在中国社会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却受到广泛地尊崇,对中华民族的伦理思想和个人行为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孝经》集中



地阐述、宣扬了儒家思想观念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孝道与孝治。书中将孝道视为道德礼教的源头和君主治理天下的“至德要道”。需要注意的是，《孝经》虽以论孝为起点，但其核心目的却在于以“孝”劝“忠”，并因此而受到历代帝王的推尊和提倡，长期以来，被列为童蒙课本，成为家庭和学校的必读之书。世易时移，古人的伦理要求和行为规范，用现代的眼光来看，必然有不合时宜甚至落后腐朽的地方，所以，无论是《论语》还是《孝经》，我们都应一分为二地分析对待。

自汉代以来，关于《孝经》的注疏、研究之作达数百种之多，本书以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中的《孝经》（唐李隆基注，宋邢昺疏）为底本。考虑到《孝经》文字较少，故全文引录，写作体例与《论语品读》一致。

宋人洪迈说：“注书至难，虽孔安国、马融、郑康成、王弼之解经，杜元凯之解《左传》，颜师古之注《汉书》，亦不能无失。”（《容斋续笔》卷十五）本书以作者的浅陋，其中舛错谬误，必定在所难免，请读者批评。书中“品读”虽力求通俗易懂，但由于古代典籍本身的历史、文化因素，也许仍有难解之处，而“扩展阅读”材料，因来源复杂，部分文字也较为晦涩，读者谅之！